

学林

◀（上接 7 版）

是拉丁地区。通过逐一排除这些证据，作者似乎动摇了约翰·卡西安存在的根基。

第二、三、四章致力于建构“被遮蔽的作家，撒巴特的卡西安”。这里涉及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借助严格的文献校勘建立梅黛奥拉抄本最后 45 页缩略本与撒巴特的卡西安的关联。学界普遍认为，《要则》和《对谈录》先由拉丁文译成希腊文，后来才有了希腊文的缩略本。但察马里斯通过对比这两本书的缩略本，认为“拉丁教父大全”（*Patrologia Latina*）中的拉丁文缩略本和残篇是根据梅黛奥拉抄本译成的拉丁文译本，“希腊教父大全”（*Patrologia Graeca*）中的希腊文缩略本则是对这些拉丁文译本的再一次翻译，正是因为这些二次希腊文翻译的出现，加深了其原始语言是拉丁文而非希腊文的印象，巩固了约翰·卡西安的“神话”。另外，通过列举卡西安所使用的诸多希腊语特有术语的例子，他指出有些表达在拉丁语中没有任何知识背景，对拉丁传统来说是异质的，反而在希腊语中有着“悠长丰实的传统”。至此，一个希腊语作者的面目在他的论述中逐渐浮现。

但这与撒巴特的卡西安有何干系？为了解释这一缺漏，察马里斯只能回到撒巴的劳拉修道院。他认为，从一些抄写习惯来看，梅黛奥拉抄本正是诞生在这所修道院的缮写室里。9 世纪的修士们通过抄本的标题和引语，为他们曾经的院长、撒巴特的卡西安正名——因为卷入教义之争，这个名字曾经在 6 世纪的第二次奥利金主义争端中被“处以精神死亡和完全消失”。结合神学争端的背景，他使自己的猜测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

承接上文，第五、六、七章将撒巴特的卡西安置于 6 世纪大环境下。察马里斯提示读者，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碰撞是当时特有的一组现象，卡西安的作品正反映了这种张力。他接受了奥利金、狄迪穆斯、克莱门等人的神学遗产，但在基督教内部反希腊主义运动和以查士丁尼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干预下，他拒不服从的姿态使其处境更为艰难，也因此“消失”了数个世纪。这种解释又回归到了主流认识之中，为这两部反叛性的著作（包括它的姐妹篇《一位新发现的希腊教父》）收了一个不那么反叛的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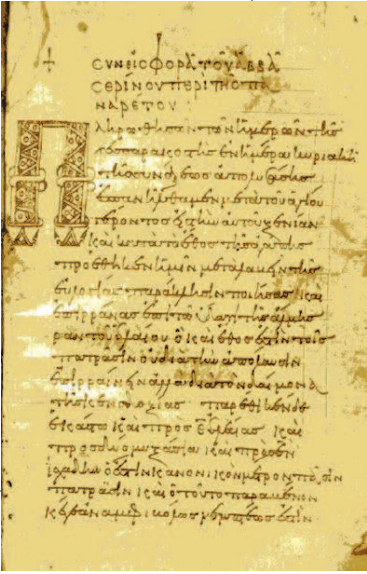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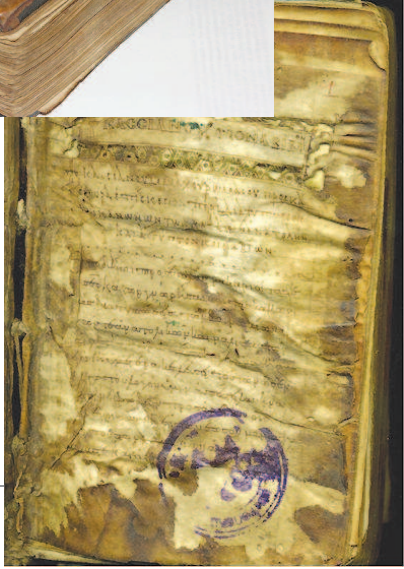
被证伪的证伪

然而，虽不至于没有可能推翻这样一位有着长期学术传统支撑的圣徒的身份，但也需要更多有力的证据。约翰·卡西安的拉丁语作品自有清晰的流传脉络和文献传统。在 5 至 9 世纪这段时期，《要则》和《对谈录》的章节是分开传抄的，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北部博比奥（Bobbio）修道院的 8 世纪安色尔体抄本，其中就只囊括了《对谈录》前十卷的内容。直到 9 世纪以后的编辑们才开始将这些文本编为合集，如 9 世纪的一份伦巴第语抄本涵盖了《对谈录》二十四卷全部内容。现代较为权威的版本则是收于“教会拉丁作家集成”（*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的校勘本。与之相对的是反证的匮乏，察马里斯承认“梅黛奥拉抄本是能揭露这一谎言的唯一一份现存文献”，面对长篇累牍的拉丁传统，一份 9 世纪的希腊文缩略本显得格外单薄，以它为出发点的论证也充满了漏洞。

2015 年，美国学者科伦巴·斯图尔特（Columba Stewart）在《教会史杂志》（*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察马里斯这两本著作的书评，系统回应了他所做的证伪工作。斯图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察马里斯最大的漏洞是未能通过文学史和希腊、拉丁语版本的文本对比，回答修道作品的作者身份问题。从文学史来看，如果《要则》和《对谈录》的拉丁语版本是对 6 世纪希腊语版本的翻译和扩写的话，很难解释它们对成书于 6 世纪 20 年代的《师尊规章》（*Regula Magistri*）以及 540 年左右的《本笃规章》的直接影响。对照《师尊规章》和拉丁语版本、梅黛奥拉抄本，可以发现《师尊规章》逐字逐句引用了拉丁语版本，包括一些在希腊语版本中没有出现的短语，比如拉丁语版本的《要则》第四卷 39 章中提到的“通往谦卑的途径”也出现在了《师尊规章》中，很快又被《本笃规章》沿用。这两部修道规章与所谓的“撒巴特的卡西安的希腊语作品”几乎同时问世，时间上后者根本没有翻译和扩写的余地，遑论其译文会被引用了。即便我们认为《师尊规章》和《本笃规章》的成书时间不够确切，那么 6 世纪的卡西奥多罗斯



梅黛奥拉抄本
(Codex Metamorphosis
573)封面及内页



（Cassiodorus）也曾称赞卡西安的拉丁语写作风格，作为兼通希腊和拉丁文学的博学之士，他怎么会受到“拉丁语译文”蒙蔽、略过“希腊语原文”呢？约翰·卡西安的作品传诸久远，抹煞他的同时需要抹煞更多相关引文，而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另一方面，从文本本身而言，察马里斯的论证也有许多不合逻辑之处。正如斯图尔特所说，“约翰·卡西安的拉丁语文本的体量远大于撒巴特的卡西安的希腊语文本，至少有 15 倍之多。希腊语文本的每一段都可以在拉丁语文本中找到。是增还是删，通过句子、段落以及整卷内容就可以一目了然，更不用说都没发现希腊语的全文了。”察马里斯通过对比拉丁语缩略本和梅黛奥拉抄本，认为前者译自后者，但只要回到拉丁语全文，便能发现梅黛奥拉抄本中的希腊语缩略本并无新的亮点，更像是一份中规中矩、经过删节的译本。此外，很多学者都认为卡西安的拉丁语文本有着谨慎的写作计划和执行方案（这也是许多古代作品的特点），如果它们是希腊语文本的翻译和扩写，那已然是相当大程度的文学重构了，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斯图尔特判断道：“一个语言能力良好的人，翻译了一份对更长的拉丁语文本的文雅的希腊语摘要，才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人可能还是这本评注和其他作品的作者。”至此，他不仅证伪了察马里斯的“证伪”，还提出了一个颇有建设性的意见。

除了斯图尔特在大方向

上的批判，《重访真正的卡西安》中的一些细小论述环节也值得商榷。例如书中认为，如果卡西安是马赛修道运动领袖，那他为何没有提及当地的主教、神父或者修士？为什么将他的神学作品题献给了一个生平模糊的卡斯托主教，而不是当时的马赛主教普罗库鲁斯（Proculus）？这一质疑低估了早期修道中心林立局面的复杂程度，教会中上层人士的交际圈还有待深究。而且恐怕只有后世伪造的书，才能做到与当代掌握的信息严丝合缝；反之，这种不对称性恰好验证了其真实性。另外，察马里斯的论证方式也不够具有说服力。他经常引用查德威克对《要则》、《对谈录》传抄过程中出现的篡改、谬误和文本变更的分析，以及古德里奇认为“卡西安在高卢的实际影响力不大”的观点，借此说明现存的拉丁语版本是经过篡改的“伪作”，约翰·卡西安也不曾出现在高卢，还宽容道：“查德威克他们没有在结论上走得更远，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或学识，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梅黛奥拉抄本的存在。”可查德威克、古德里奇等学者的批判性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的，他们的结论并没有消解约翰·卡西安的真实存在，反而为我们理解其人其事增加了更多细节。攥住并夸大这些“疑点”来推翻他们的基本立场，绝不是高明的论证技巧。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

总的来说，察马里斯试图把他浪漫的想象变为事实：一位“消失”的圣徒被另一个人冒名顶替了千年之久，

因为一份抄本的发现，终于在沉寂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故事的戏剧效果，岂不正像圣徒版的“马丁·盖尔归来”？但倘若没有坚实的证据支撑、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基于学术传统的审慎考量，它也只能是一个动听的故事，终究无法成为事实。

傲慢与偏见

西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考订有着悠久的传统，与此同时，史料作伪也屡见不鲜，两年前轰动一时的《耶稣之妻福音书》便是近来的一例。在这种背景下，察马里斯对“教会拉丁作家集成”所收校勘本的怀疑无可厚非。但是，正如凯伦·金教授受其女性主义立场影响而误入作伪者的陷阱，对证伪者来说，一些特定的偏见同样会引向歧途。斯图尔特指出，察马里斯似乎不愿意接受拉丁语文本先于希腊语文本写就的可能，“否定任何母语非希腊语的作家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修道思想，或者如此熟悉希腊文学和术语。”他毫不掩饰以希腊语为贵的傲慢和对拉丁语的偏见，而这也是长期以来被固化的一种认识。

罗马帝国在政教层面上可分为拉丁西方和希腊东方两部分，但语言的边界并不同政治、教会界限一致，东部皇帝治下有拉丁语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也控制着一些多瑙河下游的

（下转 9 版） ➡